

圖一 唐 陸柬之 文賦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《文賦》卷中宋高宗「紹興」印的發現

趙茂男

初唐書家陸柬之（生卒年不詳），約活動於太宗、高宗時期，蘇州吳郡人，以善書名家。官至朝散大夫，太子司議郎。年少時曾從其舅父虞世南習書，得其筆法傳授，而能變化不拘，結構自成一體。在唐宋之際頗受推重，或稱其書學虞草體，用筆青出於藍；或謂與歐陽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並稱，而能揚聲騰氣於世。

歐、虞、褚三家天資既高、學力又深，再輔以太宗的揄揚，遂奠下崇高的書史地位，造成極為鉅大的影響。陸柬之雖亦享有盛名，但因傳世書蹟太少，影響有限之故，以致後世對其豐富的書法內涵普遍認知不足。

愈到晚近，其名愈不顯，多數的書史論著甚而將其排除在「初唐四家」之外，由薛稷取而代之，其書史地位的升降的確值得予以重新檢討。

目前可見的陸柬之書蹟，僅《文賦》、《蘭亭詩》、《得告帖》三種。其中，《得告帖》為刻帖，可存而不論；墨蹟本《蘭亭詩》已有論者證為偽作；因此，台北故宮所藏《文賦》卷（圖一），便成為最有可能體現陸柬之書法本色的重要依據。

《文賦》卷的作者歸屬，一般認為應是根據的卷後元代趙孟頫（一二五四—一三二三）的題跋而定，自此而下，歷代鑒者均極推崇此作，以為

深得蘭亭遺韻，是陸柬之最佳的傳世書蹟。然而，卷中既無作者題款，元代之前的著錄也無載錄，是以此卷在唐、宋之間的藏傳狀況均不可得知，故此，部分論者對其真偽往往持保留態度。從近代的相關評述來看，贊之者譽為初唐行書第一，（註一）認為可從中看出陸氏的才情和風格；（註二）疑之者斥為全無晉唐人風格，（註三）甚而揣想或許是趙孟頫少年之作；（註四）折衷的論點則以為一件傑出的墨蹟，即便傳非其人，而風格與其時代相近，仍不失其參考價值，自當加以珍視。（註五）由此而知，其中論點歧異頗多，評價落差亦大，要論定其真偽實為不易。本文則是聚焦於卷中一顆目前尚未被提出討論的印記，以此印記的發現與考察為主軸，期能對此卷在宋代的藏傳狀況有更多的瞭解，進而重構此卷的藏傳歷史。

《文賦》卷中的「紹興」印

陸柬之書《文賦》卷的收傳印記，最早的載錄見於《石渠寶笈初編》卷三，云：

卷首有「孫氏」、「珍玩」、「真逸」、「山房」、「傳家」諸半印。卷後有「河東李個士弘章」、「員嶠真逸」、「忠信傳家」，諸印。又一印不可識。卷中幅壓縫「員嶠真逸」、「河東李個士弘章」、「孫氏」印，各七。

上述諸印，以時代而言，李個諸收藏印應是最早的收傳印記，而一件傳為初唐名家的書蹟，既無款識，且在元代之前也無著錄，被批評為非晉非唐，也因書風與趙孟頫極為相近，而被懷疑可能是趙孟頫少年之作。可惜的是，這些批評和質疑都無更積極的證據來驗證其論點。若僅靠目鑒，恐失之誤斷；而文獻闕載，又難以求真。因此，讓證據說話應是目前釐清問題的最佳方式。

如果仔細觀察故宮藏《文賦》卷的收傳印記，其實可以找尋到一顆至今仍未被提出討論的印記，此印即為宋高宗（一一〇七—一一八七）之「紹興」二字連珠印。

印的位置極為特殊，在本幅左側

最下方，由於被「忠信傳家」印疊鈐在下方，且印色暗沈，印文復有殘損，乍看之下的確不易察覺，所以歷來皆為論者所忽略。此印上下兩個邊框長寬各為一·五公分，與目前所見的同形式「紹興」連珠印大小正吻合，底下一字印文不全，有被裁切的痕跡，此應是重裱時為裱工所裁去。細檢其印文，隱約可看出上一字為「紹」，下一字是「興」的上半部，經電腦處理復原後，則可清楚看出此印的基本面貌（圖二）。



圖二 文賦卷上疊鈐之「忠信傳家」及「紹興」二印

「紹興」二字連珠印是宋高宗的收藏印，關於宋高宗御府收藏書畫的鈐印格式，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有詳細的記載：

高宗御府手卷，畫前上白引首縫間用「乾卦」圓印，其下用「希世藏」小方印，畫卷盡處之下，

用「紹興」二字印。墨跡不用卷上合縫挂印，止用其下「希世」小印，其後仍用「紹興」小璽。

以此標準來檢視目前所見紹興御府所藏書蹟，據王耀庭〈傳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畫外的幾個問題〉一文指出，僅有晉王羲之〈快雪時晴帖〉符合此一格式，此卷原為卷裝，後為清馮銓之子馮源濟改為今日所見之冊頁。（註六）卷前有「希世藏」小方印，其卷尾之「紹興」印，印文與《文賦》卷正相同。另外，卷前無「希世藏」小印，卷尾下方則有與上述相同之「紹興」連珠印者，是屬於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的遺存。傅世繪畫中具此一形式者有：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〉、唐韓滉〈五牛圖〉、五代巨然〈蕭翼賺蘭亭〉、〈宋人人物〉等。而傳世書蹟則分別為：南朝梁王志〈一日無申帖〉、唐歐陽詢〈夢奠帖〉、唐陸柬之〈蘭亭詩〉卷〈刻帖本〉、五代楊凝式〈韭花帖〉等。（註七）除此之外，尚有東晉王羲之〈范新婦帖〉（宋拓真賞齋帖）、楊凝式〈神仙起居注〉也鈐有此印（圖三）。



圖三 傳世書蹟上的「紹興」印

透過上述諸卷印記的觀察，可知「紹興」連珠印皆鈐於幅尾下方，和周密所述宋高宗御府用印的規律頗為一致。

至於〈文賦〉卷中的「紹興」連珠印，雖有殘損，但經過仔細比對後，可知與上述諸卷書畫之「紹興」連珠印，不論是印式、尺寸，或者是鈐蓋位置，皆若合符契，顯示此印為真的成分極高，果如是，則得以據此推斷此卷應曾入藏於宋高宗御府中。而此一發現，更將此卷信而有徵的流傳史上追溯南宋紹興（一一三一—一一六二）時期，亦可推翻此卷為趙孟頫少年之作的說法。

「紹興」印與「忠信傳家」印疊鈐情況之討論

卷中「紹興」連珠印與「忠信傳家」印的疊鈐情況頗為特殊，兩印既是疊鈐，則孰先孰後，實關乎此卷流傳史的確定，而疊鈐的狀況似亦潛藏著某些意涵，以下則針對此一現象加以討論。

據《故宮法書第四輯·唐陸柬之

書陸機文賦》指出：

以上諸印，除「孫氏」一印為清孫承澤之外，其餘均為元李侗印章。李侗字士弘，號員嶠真逸，好右軍書，所居山房，以擬晉題其顏，故有以上諸印。……收傳印記除李侗孫承澤諸印外，別無他印，清乾隆鑒藏五璽全。

由此知「忠信傳家」印為元代李侗的收藏印。李侗，字士弘，號員嶠真逸，太原榆次人。工書善墨竹，元貞初歷官集賢侍讀學士，大德中出為臨江路總管，以劾罷，後起為延平路總管，改為兩浙鹽運使，致仕歸。卒諡章肅。戴表元〈擬晉山房記〉云：「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宏，以好書名天下，稍暇，則取晉右軍，縱筆擬為之。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硯席，諸供具花物，皆奕奕有晉氣，由是以『擬晉』題其顏。」（註八）此中道出李侗追摹古人、崇尚晉韻的品味與趨向。與趙孟頫、鮮于樞、戴表元、袁桷等書畫家、文人交往甚密。惜傳世作品不多，目前僅見於文賦卷後二跋。如果「紹興」印是屬於後添，則

明顯是作偽者或好事者所為。一般論及作偽者的心理動機，不外乎牟利、遊戲、好事、逞才、爭勝、求名等等，（註九）若以這些心理動機來觀察「紹興」印在此卷所能發揮的作用，可以想見作偽者的目的實難以達成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就目前〈文賦〉卷的保存現況而言，此印位置隱微，極難察覺，不符慣見之作偽手法。其二，現存題跋和相關著錄，並未發現任何與此印相關的載錄，其作偽意圖顯然無法受到歷代賞鑒者的關注。基於此，此印出於作偽者後添的假設當可排除。

若以印記所屬的年代而論，則「紹興」印在前，「忠信傳家」印在其後，亦即李侗鈐蓋自家收藏印時，「紹興」印即已存在卷上，而疊鈐的原因，由於相關文獻不足，無法確知。不過，從本幅卷首、卷尾李侗諸印鈐蓋手法的差異來看，則可能是卷尾空白間隙過於窄仄所致。

比較一下本幅卷首和卷尾內文與李侗諸印的鈐蓋位置，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（圖四）。卷首

自此而後，卷上的「紹興」印就注定隱於一隅，雖歷數百寒暑，始終未能重現原貌，其本身所負載〈文賦〉卷流傳軌跡的重要訊息，遂湮沒於浩蕩的歷史洪流中。

小結

回顧陸柬之書〈文賦〉卷的藏傳軌跡，從趙孟頫到孫承澤，從《庚子銷夏記》到《故宮書畫錄》，不論是鑒者之跋或相關著錄，對於印記的載錄和評述都相對貧乏，使得一顆與此卷流傳歷史息息相關的印記，始終蟄

諸印與內文間距較寬，約在一·五到二公分之間；而卷尾諸印卻緊緊逼近內文，首尾如此的差異，頗耐人尋味，似乎是爲了遷就本幅尺寸而作的現實考量。亦即卷首餘紙比卷尾餘紙的空白處要來的寬闊，而「員嶠真逸」、「擬晉山房」、「忠信傳家」三印在首尾兩處既要上下相互對應，又須鈐於本幅之內，於是卷尾諸印就只能緊緊靠近內文，因此「忠信傳家」印與「紹興」印的疊鈐情形就成爲不得不然的結果。

伏於幽暗之地，潛藏在方寸之間，數百年來一再地被忽略，而此卷也由於缺乏十三世紀之前的藏傳紀錄，徒增不少關於真偽的論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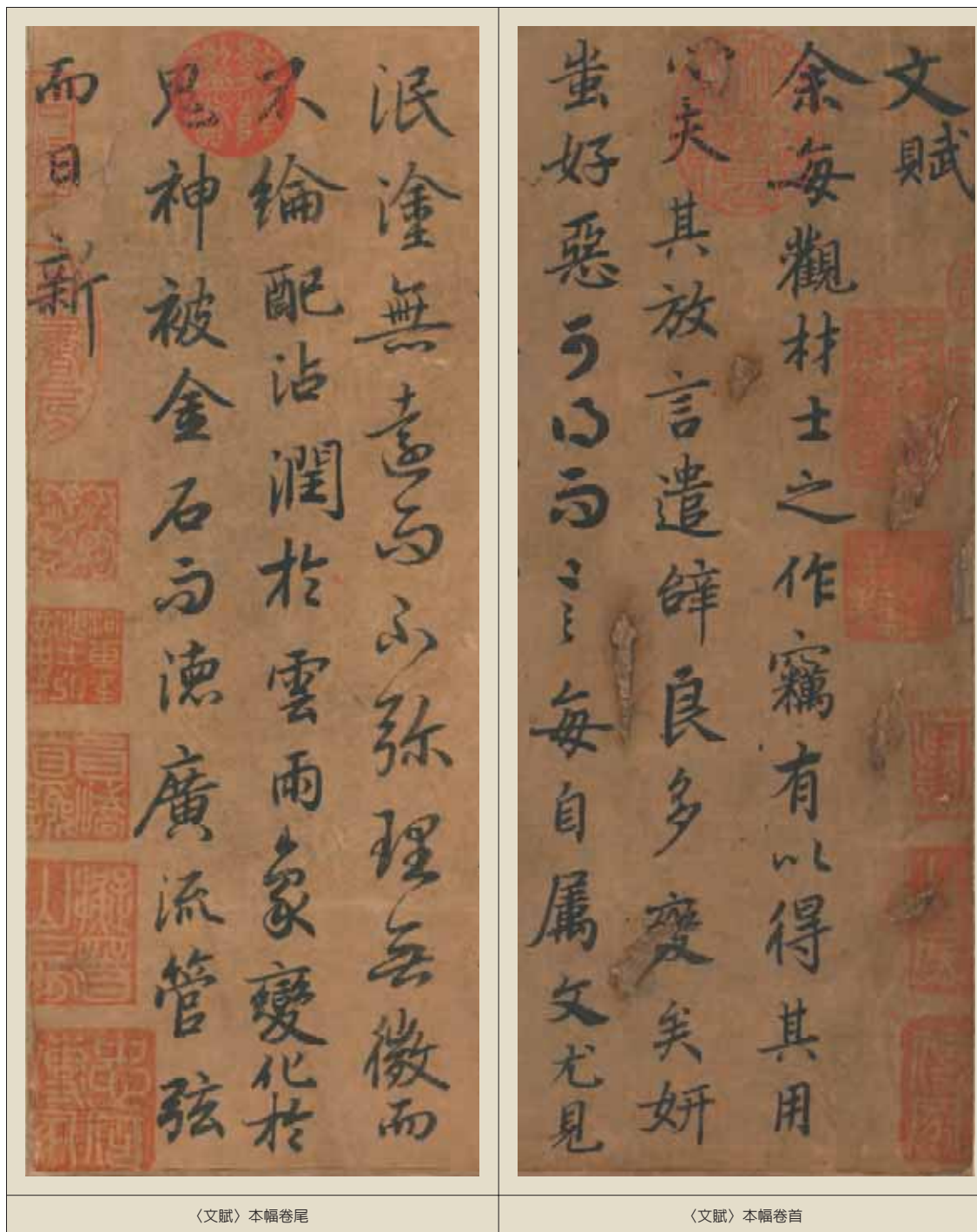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旨在通過對〈文賦〉卷上「紹興」連珠印的發現與考察，試圖重新建構此卷在南宋的流傳軌跡。綜合上述，首從此印的印文形式和相關位置作考察，比對出此印和數件傳世書畫名蹟的印文如出一轍，並且都鈐於幅尾下方，契合周密所述紹興御府書畫的鈐印規律；其次，經由此印疊

鈐情形的分析，可知此印並非好事者後添，而觀察李個諸收藏印於幅前、幅尾鈐蓋手法的差異，則能反證出此印在李個收藏之前就已存在的事實。因此，「紹興」連珠印的發現，爲陸柬之書〈文賦〉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旁證，此卷則可推定確爲宋高宗御府舊藏，其完成年代亦不應晚於紹興年間；至於此卷可能爲趙孟頫少年之作的說法，顯然是無法成立的。

作者爲私立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研究生

註釋：

1. 叢文俊，〈〈文賦〉解說〉，收於孫寶文編，《陸柬之文賦》（長春：吉林出版社，2001）。
2. 姜一涵，〈唐代大書家陸柬之及其所書文賦〉，《中國一周》（台北：中國一周社，1967），第915期，頁21。
3. 徐邦達，《古書畫偽訛考辨》，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4），第一冊，頁79-80。
4. 王耀庭，〈唐陸柬之書文賦卷與蘭亭書風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9）第七卷，第八期，頁33。
5. 張光寶，〈李個與陸柬之書文賦卷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5）第三卷，第六期，頁112。
6. 參見王耀庭，〈傳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畫外的幾個問題〉，收於《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，2004），第十七期，頁9。
7. 王耀庭云：「南朝梁王志〈一日無申帖〉（遼寧博物館藏），左下有「紹興」連珠印。唐歐陽詢〈夢奠帖〉（遼寧博物館藏）左下有「紹興」連珠印，此卷拖尾有元金城郭天錫於原出辛卯（前至元二十八年，1291年）之題跋：「前後御府法書二小印，後有『紹興』小印。」當指此印。唐陸柬之〈蘭亭詩〉卷後有「紹興」連珠印，雖是刻本，應是同出一印。五代楊凝式〈韭花帖〉，此卷拖尾有元張晏大德八年題識，以爲是「《宣和書譜》所載」……「紹興以厚價得之。」足以以此「紹興」連珠印相印證。以上四卷也是「紹興書畫式」的殘存。」同前引書，頁8-9。
8. 戴表元，《剡源集》，收錄於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9），第65冊，頁51。
9. 傅申，《書法鑑定：兼懷素〈自敘帖〉臨床診斷》（台北：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4），頁28。



圖四 〈文賦〉卷首、卷尾李個「員嶠真逸」、「擬晉山房」、「忠信傳家」諸收藏印鈐蓋位置